

作家的修养

□张瑞田

我清晰地记得五年前目睹的一件事——某文坛新贵为数十人的文学爱好者讲课。我也是数十人中的一员，聆听了此公的高谈阔论，获益匪浅。课间休息时，十几位同学蜂拥而至，欲与文坛新贵合影留念。开始，此公洋洋自得地与几位同学合影了，少顷，又如同娱乐圈中人，不耐烦地推开其他人，走向了远处。恰逢一位同学迎面而来，忙说：“能与您合影吗？”此公回答：“没有时间。”旋拂袖而去。

我依旧记得对一位作家的采访。为进行文学社会学的调查，我采访了这位“名闻遐迩”的作家。当我问及此公对当代其他作家的印象时，他一脸不屑地说，当代没有作家。听话听音，此公认为当代没有作家，其实是在告诉我，他自己才是真正的作家。

不久，与几位作家清谈，言及起于墨西哥的猪流感 and 生存环境的恶化，这几位炙手可热的文坛知名人士均表示，作家不需要关注这样的事情，把文章写

好就行了，把文章卖出去就好了。

人都是主人的现代社会，我们必须尊重任何人的合法选择。对平民的厌恶，对同道的轻蔑，对公共事务的冷漠，似乎不关涉作家的职业道德，甚至也不影响作家们的合理存在。重要性在于，以上列举的一些作家的言行，恰恰证明了当代作家的修养危机和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困境。

我而再地强调作家的知识分子角色，在于我对清末民初一些文人的敬重。康有为的文章可圈可点，此外，康氏亦是知行合一的政治家、思想家和教育家。他在广州办万木草堂，办学宗旨明确了平民学子生存际遇的关心。凡平民学子入学，一律免除学费。笔者两度造访万木草堂，曾写《寻访万木草堂》一文记之，表达了对康有为人格伦理和教育思想的尊敬。章士钊在“文革”初期，致信毛泽东，反对打倒刘少奇。强烈的民族忧患，使他没有回避政治风险，毅然决然地坚持了真理。章士

钊的学生高二适亦然，在“兰亭论辩”的学术交锋中，他清楚此中蕴含的政治悲情，大胆质疑郭沫若，使我们在阴霾密布的天空中看到了真理的曙光。

我们一直把康有为、章士钊、高二适看成我们骄傲的前辈，其中重要的一点，便是他们大义凛然的精神操守，洞穿世事的锐利目光，堪比磐石的高贵人格。

难能可贵的是，我们没有忽视他们的存在。对康有为思想的研究，对其文章的探析，一直是当代学术界的热点。章士钊的政治身份，遮蔽了他作为作家的光辉。相比较而言，因文化界、学术界、书法界对“兰亭论辩”的集体缅怀，高二适的形象被逐渐放大，终成一代文化偶像。有趣的是，“兰亭论辩”中章士钊所起到的积极效应，屡被提及，使我们了解到章士钊伟岸的人格。

知识分子需要任重道远的弘毅精神——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忧患意识，对弱者的关心，对环境的关爱，对

强权的反抗，对梦想的渴望，对生命的精神救赎……

那么，作为知识分子的作家，在当下的表现却不尽人意。有可能是，某些作家过于沉溺于技术而忽视了道义，过分看重市场而忘记了责任，过于追求功利而遗忘了理想，其结果自然是人格委顿，急功近利，本是一个丰富多彩的生命，遗憾地异化成了“单向度的人”。于是，此文开篇部分的事情在这样的背景里就“合情合理”地出现了。

这绝对不是合情合理的事情。依笔者看来，我所见到的几位作家，他们在市场经济中迷失了选择的方向，甚至迷失一名艺术家或一名知识分子的价值取向。我为当下知识分子寻求经济强大的行为鼓噪了多年，我至今相信，经济独立对坚持真理、主持正义将起到何种作用。我反对的是，消费主义思潮下的拜金倾向和膜拜权贵的媚俗意识。两者无疑是现代法治社会的精神肿瘤，是我们走向现代化中国的精神障碍。

行者无疆

提起汽车，必然要提到德国，就像提到啤酒必然要提到德国一样。

奔驰、宝马、奥迪、大众……德国是当之无愧的汽车王国，是现代汽车之父——卡尔·弗里德里希·本茨的家乡。在1886年1月29日，两位德国人卡尔·奔驰和戈特利布·戴姆勒获得世界上第一辆汽车的专利权，标志着世界上第一辆汽车诞生，而这一天也被人们称为汽车诞生日。

我在德国期间有幸参观了奔驰、宝马和大众的汽车总部，从第一辆汽车的诞生，发展到今天的现代汽车产业，德国人一步一个脚印，使汽车的技术、质量、安全、舒适、速度都达到了世界顶尖水平。众所周知，德国的宝马、奔驰、大众享誉世界，行销全球。德国把汽车销往世界各国获取了巨大的经济效益，然而，德国人自己驾驶的车辆则大多数是空间很小的两厢车。因为这种车型不仅能节约能源，更能保护环境，还节约了城市空间。关键一点是，他们不像我们把汽车当作财富和面子的象征，他们认为汽车只是交通工具，为自己用的不是为他人看的。更有趣的是，德国还有很多年轻人开的是只能坐两个人的迷你库珀，编号叫气死丈母娘。

消费者为什么喜欢德国车？是他们相信德国人！民族性格铸造民族品牌，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每个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都会形成自己独特的民族文化，而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决定着国家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的创造力和品牌价值，文化的力量不仅支撑起民族的精神品质，还创造了民族的物质品牌。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个民族的文化性格特征的形成和这个国家的地理、历史、经济、政治的发展密切相关。独特的山川地理和历史文化造就了德国人独特的民族性格。德国人的民族性格特点大致可以概括为：务实、严谨、勤奋、守时、节俭等。

德国的宗教革命家马丁·路德曾经说过一句话：“即使我知道整个世界明天将要毁灭，我今天仍然要种下我的葡萄树”。这句话充分显示了德国人埋头苦干、不肯苟且的精神。曾经，我和一个德国教授讨论一个问题，请他用几个关键词来概括一下德国人的性格。他说：这个问题你可难住我了，我是匈牙利人，在德国生活工作几十年，我对德国人的印象是：认真、认真、太认真，认真得几乎有些保守了。

世界公认的有三大汽车强国，德国、美国、日本。我买车的时候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德国车，因为从汽车就可以看出一个民族的文化性格。美国人太自信，太自负，太强悍，所以造出的汽车大气、笨重、费油，且一成不变。美国的汽车之城底特律破产就预示了美国汽车产业的前景。日本人太精明，太小气，太注重成本和效益，日本车尽管省油但安全性较差。相比之下，选德国车不失为性价比很高的明智之举，所以我买了速腾。

汽车和交通是个孪生姐妹，德国的汽车如此发达，德国的交通状况怎么样呢？德国人口8千2百万，汽车保有量达4千9百万辆，其中轿车4千1百万辆，平均每两个人就有一辆轿车。德国国土面积只有中国的4%，略小于中国的云南省，但公路总长度已达23.1万公里，其中高速公路1.2万公里。高速公路的不少路段不限速，大概是有意让名

德国的汽车和交通

□李正国

车出风头，也让飙车族有个地方过把瘾。想象一下，如此众多的汽车，如此密集的公路，如此繁忙的交通，还有世界上开车最快的民族，德国该是怎样一个令人忧心忡忡的国家啊！然而，实际情况并不那么糟糕。

德国甚至是世界上交通安全状况最好的几个国家之一，交通死亡人数在逐年下降。2008年，德国因交通事故死亡的人数为4467人，万车死亡率只有0.9，远远低于中国。那么，这个在“汽车社会”中摸爬滚打了一百多年的国家，其交通状况能给我们什么启示呢？

第一，德国人遵纪守法。有人曾说：在24时开车，看见红灯还停车的人，全世界只有德国人。半夜两点，夜深人静，路上无车，行人耐心等待，人行绿灯亮，行人才开始过马路。那么，这个人一定是德国人。这既是笑话，又不是笑话。德国的十字路口没有交通警察，信号灯是车辆和行人共同自觉遵守的“铁线”，汽车在斑马线前必须礼让行人，没有人随意变道超车，德国不仅有汽车，德国更有汽车文化。这一方面说明德国人在遵纪守法方面具有很强的自觉性，同时也说明德国是一个执法严格的国家。

第二，德国人的交通安全意识和措施都很强。我在德国遭遇了二十天的大雪天气，无论城市交通或城市间交通，一点都没有受到影响。城市中，屋顶、院落到处都有很深的积雪，但城市主干道上和行人道上被清扫得干干净净，并且那里的地砖都是防滑的，你想摔倒都很困难。高速公路两旁雪域茫茫，但高速公路上没有雪花，丝毫不影响汽车的通行。可见，德国人的交通应急能力和化雪设备是何等的先进，工作态度是何等的认真。

第三，德国的交通规章很人性化。在德国人的交通理念中，人是第一位的，车让行人是一种文明举止和礼仪规范。在便道上，驾驶员只要看见有人想过马路，汽车就会停下，司机招收示意你先过。大巴司机在路上行驶两个小时，必须强制休息。德国还规定周末大货车不能在高速公路上行驶，以便把高速公路让给开小车度假的人。

德国有汽车，更有汽车文化，中国的汽车越来越多，那么，中国有汽车文化吗？我的回答是：很遗憾！

如今，堵车、堵城已经成为中国各大城市的关键词，什么时候你所在的城市开始堵车了，证明你就成了大城市的居民了。除了车多路窄之外，不文明的驾驶行为占很大因素。我们可以用成语来形容中国人的驾驶习惯：见缝插针、争分夺秒、争先恐后、左右迂回、乘虚而入……

在城市里随意变道；在高速路上遇到拥堵马上两道变四道，连应急车道也堵得严严实实。很多人奉行：“我不走谁也别想走”，最后，确实是走不了。安全带即使带了也是为警察带的，更有甚者，有人发明了一种堵头，塞在安全带的插口上，不让他提示报警。这不是掩耳盗铃是什么？酒后驾车超速行驶，夜里遇车从不会灯，你亮我比你还亮，看谁牛过谁！特别是很多司机对人行横道视而不见，甚至在人行横道上和行人比冲刺。

对于这些，我们要深刻反思一个问题：我们富裕了，可以买汽车，但能买到汽车文化吗？从某种层面讲，我们的交通问题不是汽车数量问题，而是开车人的问题，国人的交通文明素质不提高，每个人都可能自觉不自觉地成为交通不文明现象的制造者。



视觉

海螺沟冰雪盛宴

江宏景 摄

青年书房

唱给青春岁月的祭歌

——评《阁楼上的青春》

《阁楼上的青春》是近年来丰产的川籍著名作家何大草的一部校园文学作品，是他“残酷青春系列”中最有分量和张力的一部。在该书中何大草展示了青春的残酷一角。何大草坦言，这本《阁楼上的青春》小说创意源于他多年前出版的小说《我的左脸》，这部小说出版后，他总觉得意犹未尽，于是从2009年起，他开始再次创作，加入更多故事元素，让思想走向多元。“如果说《我的左脸》是一棵树，那么《阁楼上的青春》就是一片森林。”



书名：《阁楼上的青春》
作者：何大草
出版社：安徽文艺出版社

小说描写了我国西南部某县重点中学——文庙中学及泡桐树中学——一批尖子学生的校园和家庭生活、不同的境遇与追求以及复杂的感情纠葛，成功地塑造了何有力、熊思灏、黄珏、叶沅、朱丽、韩韩等形形色色的优秀生形象以及作为对比的落后生形象，并围绕这些学生，连带塑造了一批教师、干部、工程师、工人、农民、警察、演员、小市民、煤老板等各阶层家长的不同面貌，客观地揭示了当下中学教育的真实现状，以及转型社会的各种现象，如激烈竞争、贫富差距、金钱诱惑、心灵扭曲、文化颓废、公共卫生风险等。小说揭示了，青春固然是花样年华，但也是个充满负重、变数与陷阱的时期；校园固然有其相对单纯的一面，然而它也是一个有风有浪的“江湖”。这一群芸芸众生，凭着各自背景、体力、心智和欲望，在正义、善良与虚伪、自私之间徘徊和打斗，展现着青春的执着与温情、血气与叛逆、锋利与残酷、迷失与追悔、思念与遗憾，也流露出作者深深的人文

关切与人生悲悯，具有较强的生命启示意义和艺术感染力。

从历史小说《衣冠似雪》、《午门的暧昧》，到残酷青春小说《刀子和刀子》《我的左脸》……作家何大草的作品总是在风格与思想的不断转型中带给读者一次又一次的惊喜。在这部作品中，随着情节的推进，南方古都宛如迟暮美人，凄迷风情，浓荫覆盖的阁楼，隐藏秘密的大剧院，蒙蒙的阳光和雨水，汗流浹背的夏天，成为故事最佳的舞台和背景。小说极生动地描写了几位高考在即的高中生中最隐秘的禁地，直抵成长史中最隐秘的禁地。小说中的人物并非直接来自于现实生活，何大草说：“我湖”小说中的人物来自我多年生活的积累，体验生活来自内心，不需要真正到现实生活中去体验。因为刀运的牵扯时有零距离的温软接触，叫人做梦娶媳妇——想入非非；那手轻柔地抚动，刀酥美地游走，梳子熨帖地修抚，很是受活，有人情不自禁，竟哼起“给个县长也不当”的小调。当兄弟的，好跟嫂子开玩笑，萧妻的原则是君子动口不动手。只要嘴皮，吞几缝道的玩笑话都说

剃头匠

□基民

萧川是这一疙瘩十里八村唯一以剃头为生的手艺人。

萧川师从父亲，父亲师从他父亲。据说，自打满清强令“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后，萧家就在乡间做起了剃头行当。逢到天灾或兵燹，虽被迫有过间歇，但事罢又操旧业，传至萧川，手艺可算得了。

上世纪50年代初，萧川18岁，便在家支起理发摊。一间屋、一把椅，村人来，“正襟危坐”，三下五除二，拾掇到位，照镜子一看，美得直呼“哩格隆”。钱呢？3分5分，毛二八分，多付也中，少给也行，真没钱了，乡里乡亲的，拍拍屁股走人，也中。随着声名远播，十里八村的人都来，门口常排队长，他昼夜连轴都剃不及。心想，若有儿子帮着多好。后来结了婚，尽管没少使暗劲，生儿却非吹糠米，不能“立等可取”。“远水”没指望，便取“近水”。他便教媳妇人行。媳妇还算听话，很快学得真传。他让媳妇在家支摊，自己挑上担子，各村游走，变众人跑腿为剃头上门。

萧川个头细长，瘦巴子筋，麻秆一样。媳妇却生得丰腴，长得俊俏，颇有大家闺秀的风韵，追婚人曾折门楣，她不睬，偏偏看好相貌平平的萧川。对此，遭拒者愤然，说萧川半路捡个驴料兜——捡了便宜。

不管那些“酸葡萄”说词，萧川只管挑着担子游村剃头，无论老人小孩，活人死人，白天黑夜，路远路近，只要招呼一声，保证随叫随到，质量不含糊，钱，从不多要。那次，给一车祸近者剃光头，弄得一手半身沾血，主家意过不去，给了一块钱，他只收一毛，感动得主家泪眼花花。一次，返家途中，在小石桥上捡到一个钱包，内有120元钱，他替失主着急，守在原地等到半夜11点，直到那人找来，如数奉还。人家拿出10元钱答谢，他挑起担子就走，死活不要。心说：钱财算个屁，人缘才主贵！

人长得美了，容易惹麻烦，尽管美并没错，就像苍蝇硬叮香饽饽。男人喜欢让萧妻理发，这好理解。她身上香醇的气味，闻着舒心；脆甜的声音，听着悦耳；逐渐隆起的肚儿，因走刀运的牵扯时有零距离的温软接触，叫人做梦娶媳妇——想入非非；那手轻柔地抚动，刀酥美地游走，梳子熨帖地修抚，很是受活，有人情不自禁，竟哼起“给个县长也不当”的小调。当兄弟的，好跟嫂子开玩笑，萧妻的原则是君子动口不动手。只要嘴皮，吞几缝道的玩笑话都说

中，敢朝身上撩摸一把，那得拼刀兑命。一次，远房堂弟萧琦，隔着薄衫衫两手捏住她的俩乳头，说嫂呀，你这俩纽扣咋恁对称哩！萧妻“呸”他一脸，随手一巴掌兜过，他麻利躲闪，兔儿样跑开，再不敢造次。

萧川的儿子6岁时，“文革”开始了。一天，戴着“造反”红箍的萧琦找来，要他给十多个男女“坏分子”剃阴阳头，下午批斗会上革命群众要“鉴赏”。萧川说，祖上传我只有光头、平头、分头和大背头，没有阴阳头，我不会理！萧琦见他不愿干，遂上纲上线地说，不愿理阴阳头，就是不革命，就是反革命，要砸烂狗头。萧川笑笑说，割头也就碗大个疤，随便，我就是不干！萧琦找来刀剪，吆来一帮人，先把萧川夫妇捺地上，胡胡乱割成阴阳头，又把“坏分子”都较成阴阳头，一并拉去批斗……夜里，萧琦受干部指使，将萧妻拽到打麦场，俩人就着麦秸窝轮番尽逞兽欲……次日凌晨，人们发现，村头的柿树上吊着自尽的萧妻。

萧妻冤死，没人过问。萧川继续被管制，不仅不能理发，连儿子萧董也得由高龄的老娘代为照看……

日月如梭，转眼到了1990年，被“文革”弄翻的天，早翻了过来，萧琦等一帮人早被法办。没再续弦的萧川，重操旧业，并将手艺亲传给儿子。他守家在店，接待上门的乡亲。儿子挑担游村，服务十里八村。可没干几天，儿子嫌费气剃不赚钱，便进城租了门面，靠着在派出所当红的同学作后盾，开办起“童发发廊”。生意竟然很火，两年间，比他爹起早贪黑30年赚得钱还多，不仅扩大了发廊规模，还盖起了村里第一栋小楼，阔得不行。有人说真是儿出于爹而胜于爹，萧川很感自豪。随后，他听到人们不祥的议论，说那不是“童发发廊”，该叫“统统发廊”，儿子赚的不是理发钱，而是卖淫嫖娼的皮肉钱……这听不打紧，萧川差点没气死。他连夜跑进城，睁大眼瞪着端倪。当所有传言得到证实后，萧川拎着榔头将“童发发廊”砸得稀烂，砸一下说一句：叫你昧良心，叫你昧良心……儿子闻讯赶来阻拦，失去理智的萧川一锤将他的前额敲出个黑血窟窿……

翌日，发廊被查封，萧董因组织容留妇女卖淫被捕入狱，萧川气极而疯，大冬天只穿一条单裤，蓬头垢面，四处游走，逢人只说一句话：只说日子好过了，可有的人这良心……咋还就没了！



双鹤图（工笔画） 郭静作